

陈高华 杜川 刘刚 译
Spirit of Chinese People

辜鸿铭 著



精神 中國人的



陈高华 杜川 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Spirit of Chinese People

辜鸿铭 著

貳

精神 中国人的



(36) 辜

人”。原为

家督等授。

著者士和

(81) 辜

(82) 阿

在河水中度过，除未涉河水的那部分外，浑身刀枪不入。在希腊伊

第十个年头，因希腊军队掠夺去他的女俘，二将发生争吵，阿喀琉斯

退出战争，闷闷不乐，下文所提阿喀琉斯“闷闷不乐”一事即指此。

(83) 指袁口(1840-1891)，袁世凯之父，道光帝第七子，曾官

慈禧太后的妹夫，光绪皇帝的生父，1872年退都移居北京，1854年，

革除一切职务后，他留左右军机处，袁世凯之父袁

(84) 指袁世凯(1837-1909)，安徽寿州(今寿县)人，字慰庭，

为“北方地主之天子”

已死，断绝了军政职位，

为平定地区的贵族地主。

台后右翼势力的支柱。

师，曾参与清俄战争。

内人物，出生后被其母

中国新文学运动五十年

目 录



中国新文学运动五十年

上 篇 清流传

- 中国牛津运动故事 3
- 卷首引语 4
- 再版记言 5
- 自 序 6
- 雅各宾主义的中国 13
- 导 论 22
- 第一章 满人当权 25
- 第二章 中产阶级儒生之崛起 33
- 第三章 满洲贵族重新掌权 52
- 第四章 空位期：中国三头执政 82
- 尾 声 94
- 附 录 100

中 篇 张文襄幕府纪闻

弁 言 119

卷 上 120

卷 下 142

下 篇 读易草堂文集

内 篇 165

外 篇 184

附 录 192

注释索引 216



上
篇

清流传





中国牛津运动故事

下面的内容此书最早出版于 1910 年。1912 年由上海墨丘利公司 (Shanghai Mercury) 再版, 头版时扉页上写着: “献给张之洞”, 再版时又增加了一些内容, 以下内容出自再版本。

牛津运动 (Oxford Movement) 是一场发生于 1833 至 1845 年英国国教会中兴起的宗教复兴运动, 由牛津大学的纽曼、弗洛德、凯布勒等人发起, 故而得名。自 1833 年开始, 这些人陆续发表九十本书册, 故又称“书册派运动”。它标榜复兴早期基督教会的传统, 改变现有礼仪, 并企图在罗马天主教和新教之间建立一条中间路线, 在保护教会不受自由主义思想的“侵蚀”的同时, 避免世俗权力干涉教会。这场运动受到英国政界和国教会的抵制, 英国的大学领导人和各地主教谴责他们是罗马主义派, 1845 年纽曼等改宗天主教, 这一事件在英国国教会中影响很大。其后, 运动势力减弱, 运动方式也发生改变, 由皮尔兹领导, 他坚持恢复传统的教义和礼仪, 但并不皈依天主教。辜鸿铭在这里把以张之洞等为领导的“清流运动”称为“中国牛津运动”。这一运动反对现代自由主义, 反对西方物质功利主义文明, 主张更严格地按儒家的信条办事, 辜鸿铭将之与 19 世纪中叶的英国牛津运动相比拟。

卷首引语 中国

“我的英国朋友们问我：是否存在这样的美国人——有一种美国思想，对于美国未来的合理发展有自己见解的人？好一个富有挑战性的提问。对此，我既没有想到各政党会议，也没有想到国会；既没有想到总统，也没有想到内阁大臣，没有想到要把美国变成第二个欧洲之类人。我所想到的只是那最单纯的心灵。我说：‘有，当然有。’于是我谈起无政府主义和不抵抗主义的教义。我说，我的确从未见过在哪个国家有哪个人以足够的勇气去坚持这一真理。我很容易看到卑鄙的滑膛枪崇拜的破产——尽管大人物们都是些滑膛枪拜物教的信徒。可以肯定，就像上帝活着一样无疑，毋需以枪易枪，唯有爱和正义的法则，能收到一场干净的革命之效。”⁽¹⁾

——爱默生



再版记言

辜鸿铭先生的《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一书出版后，很受欢迎，需求量极大，因此有必要再版。这次出版，基本上没什么变动，只是附上了一封写给《字林西报》的信，和一篇关于德龄公主（实为郡主）《紫禁城的两年生活》一书的书评。同时还收录一封中国著名学者写给一位德国牧师的信，题为《雅各宾主义的中国》，但愿这些附加部分是有益的。

出版者

1912年4月

自序

在一个偶然的场合，笔者与一些外国人讨论这样的问题：生活在上海的中国与欧洲人相比，谁更讲道德？对于这一比较，一个英国人评论说：“那完全要看你个人的立场是什么样的了。”这位英国先生所持的此种“立场”哲学，就是马修·阿诺德先生所说的“大不列颠人特有的无神论”之代称，他说：“现在，有一种哲学在我们中间广为流传，它使人们相信，在这个世上，至善至美的品德或者最为正当的理由是不存在的——至少，举世公认和切实可行的至美品德或最正当的理由这些东西是不存在的。”阿诺德接着还引用《泰晤士报》上的一篇文章说：“试图将那些我们喜欢或不喜欢的东西强加于周围的人，这种努力将会是徒劳的。我们必须脚踏实地，因为每个人对于宗教或世俗理念的完善，都有小小的一己之见。”

现在，知情人之所以无法帮助英国人了解发生在中国的事变的真实状况，不但因为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有他（她）“小小的一己之见”，而且，也是更要命的是，他们根本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所谓“正确”或“错误”观点！

我有一个为我所熟识的英国朋友，我很尊敬他，他是上海头脑最为冷静的商人之一。有一次，他光临寒舍赴宴，我把一个书法家（他的书法的出色足以让他跻身中国一流书法家之列）的手迹拓本拿给他欣赏。不料，这位可敬的英国先生竟然表示，他敢肯定，他的买办写汉字写得要比眼前这幅出色得多——至少，笔划更为工整。你看，这就是他那“小小的一己之见”！



还有一个我认识的英国人，他出身于公立名校，近来活跃于上海上流阶层的社交圈。有一次，他欣欣然地跟我谈起诗来，他说他非常欣赏麦考莱勋爵的《古罗马之歌》。尴尬之余，我便把马修·阿诺德的相关评论拿出来给他看——阿诺德说，一个人如果不能从麦考莱勋爵那些貌似“黄钟大吕”般的短歌中辨听出毛病来，那他根本就不配谈诗，甚至还包括麦考莱勋爵的诗：

人们来到这个尘世，

死不过是或早或迟。

依我看，要我读这样的诗而不感到恶心和不自在，那真是为难我。想不到，这位出身公立名校的英国绅士看了后却对我说，那不过是马修·阿诺德的个人观点。照他看来，这些诗实在是妙不可言。因此，正如《泰晤士报》所说的那样，对于诗歌、艺术、宗教、政治乃至更广泛意义上的文明，如何才算高雅完美，何为“阳春白雪”，每个可敬的英国人都有着他们“小小的一己之见”。

当然，一个普通的英国人对于中国书法或英国诗歌这类事物发表自己“小小的一己之见”，尽管可能有害，却无关紧要。但是，像莫理循⁽²⁾博士和濮兰德先生⁽³⁾这



莫理循，《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此图为他和他的仆人们

样的《泰晤士报》驻华通讯员，他们对于已故的中国皇太后陛下的个人品德，中国的政治，乃至古老的中华文明，也自以为是地发表他们“小小的一己之见”——就如同笔者在前文提到的那个可敬的头脑冷静的英国朋友在评论中国书法时所持的态度一样。问题的关键是，当这些人将他们关于中国事变的状况所持的“一己之见”送到伦敦《泰晤士报》上发表，而英国政府又根据这些“一己之见”来制定对华政策并采取行动时，悲惨祸乱的发生也就顺理成章了——当年，从义和团运动爆发到中国民众围攻各国驻北京公使馆，这些老爷们的“一己之见”可谓居功至伟啊。至于前些年日俄两国悍然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开战，列强因所谓的“文明问题”而屠杀无辜的中国人，则更是不足为奇了。

然而，这个世界究竟有没有正确与谬误的绝对标准呢？对于艺术和诗歌，对于宗教和世俗常规，乃至对于更广泛意义上的文明，是不是没有一个公认的最正当的标准，以使我们得以据之判定世间万物孰优孰劣呢？谈到道德、宗教或文明的问题，基督教的传教士们会说：“是的，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我们基督教的标准。”同样，在中国，一个出身儒林的士大夫则会说：“哎，如果你们基督教以你们的标准评定一切，那么我们中国人就要抬出儒教的标准。”

北宋时期(960-1127年)的著名诗人苏东坡(1039-1112年，他名叫苏轼)的弟弟苏辙，曾经讲过一个乡愚初次进城的故事。故事里说，当那个乡愚见到一匹骡子的时候，硬说他看到了一头母牛。城里人说他弄错了，并告诉他眼前的牲口是骡子而不是母牛，那个乡愚却反驳说：“我父亲说它是一头母牛，你们怎么敢说它是骡子呢？”因此，如果基督教传教士告知中国的文人学士们，道德、宗教以及文明的绝对标准是基督教标准，或者，当中国文人学士也以儒教标准作为衡量一切价值的绝对标准并将之告知传教士们时，他们的所做所为就与那个乡愚一样了。

在后面的正文中，我将指出：“我们中国的文人学士，在欧洲现代物质实利主义文明的破坏力量面前无能为力，正如当年英国中产阶级面对



法国革命的思潮和理论时束手无策一样。”我还说：“要想有效地对付现代欧洲文明的破坏势力，中国文人学士需要开放(expansion)。”我这里的所谓“开放”就是需要懂得：那些后来被归纳成体系的称之为基督教或儒教的理论汇编，行为规范与信条，并不是绝对真实的宗教，正如中国的文明或欧洲文明并非是真正完美无缺的文明一样。中国文人学士之所以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是因为他们没有此种认识。现代欧洲文明无论利弊如何，其伟大的价值与力

量——说到这里，我希望能与那些认为我排外的外国朋友言归于好——就在于法国大革命以来，现代欧洲人民已经有力地抓住了这种开放观念，并且这种伟大的开放观念已经传到中国。马修·阿诺德谈起他那个时代的英国事态时所说的情形，正与中国今日的情形相同。阿诺德说：“我们长期在其中生活与活动的那种封闭的知识视野，现在不是正在打开



马修·阿诺德

吗？种种新的光辉不是正畅通无阻地直接照耀着我们吗？长期以来，这些光辉无由直射我们，因而我们也就无法考虑对它们采取何种行动。那些拥有陈规陋俗并将其视为理性和上帝意志的人，他们被这些陈规陋俗束缚了手脚，无以解脱，哪里还有力量去寻找并有希望发现那真正的理性和上帝的意志呢？但是现在，坚守社会的、政治的和宗教的陈规陋俗——那种极其顽强的力量，那种顽固排斥一切新事物的力量，已经令

人惊奇地让步了。当前的危险，不是人们顽固地拒绝一切，一味地抱住陈规陋俗不放，并将其当作理性和上帝的意志，而是他们太过轻易地便以某些新奇之物相取代，或者连陈规新矩一并蔑视，以为随波逐流即可，毋需麻烦自己去考虑什么‘理性唯上帝的意志’。”

实际上，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当前的危险，不在于人们会把马修·阿诺德所说的陈规陋俗，即因袭已久的是非标准而认为其是理性和上帝的意志，而在于他们根本不相信有理性和上帝的意志这种东西存在。伦敦《泰晤士报》说：“对于‘完美’，每人都有自己小小的看法。”不仅如此，现在自称为自由主义者每一个英国人，都认为他自己对于“完美”的看法或观点即不比别人高明，起码也和别人一样高明。他们根本不在乎我们所谓的正确理性和上帝的意志。因此，现代英国人，当他来到中国时，因为打着开金矿，卖便宜肥皂，或借款给中国人修些无用的铁路来赚钱的如意算盘，试图将“自己对于‘完美’的小小看法”强加给中国人，所以，只要中国人予以抵制，他就会怒火中烧，变成一个病态的悲观主义者，或像濮兰德先生那样写些心怀歹意、无中生有的下流事情来诽谤中国官员。

那些有头脑的英国人，在读过濮兰德之流所写的有关清朝官员的充满歹意的鬼话和令人作呕的诽谤文字后，也应该去看一看已故的戈登将军对于中国官员的有关看法。在将两者加以比较时，人们应该记住，戈登将军是一个闻名于世的基督教武士和一位君子，而濮兰德只不过是一个写通俗韵文的聪明作家和一个令人失望的中国政府前任雇员。戈登将军说：“我所想到的是，如果我们逼迫中国人进行突如其来的改革，他们将会以一种猪一般的顽固群起抵制；但如果我们引导他们，就会发现他们情愿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并极易管理。他们希望有一种选择权，憎恨突然给他们划定道路，仿佛他们于事无关，不在话下。我们从前试行的办法，就是迫使他们走某种道路，使他们付出同样的代价，并认为与他们交换意见徒费唇舌，毫无必要。”

我总在考虑那些清朝官员不得不与之斗争的最困难问题；他们可能



完全认可我们强加给他们的一切,却不会去贯彻它;我们必须承认,说起来做这做那容易,而真正做起来却要难得多。如果他们不想在自己的军队中进行改革,我们就对这些可怜的家伙大加斥责,却没有考虑到变革必须尽可能循序渐进,赢得人心。我还能替这些(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说得更多些。他们有很多缺点,但却蒙受了那些掠夺他们国家的外国人带给他们的更多冤屈。”⁽⁴⁾

在此,我想指出的是,在我看来,像濮兰德那样来中国谈进步和改革的一般现代英国人或欧洲人,他们的精神状态甚至还不如我们旧式的中国儒生。诚然,中国儒生除了他们自己的文明之外,甚至不知道有任何文明;但他们至少对自己的文明尚有所知,而如濮兰德之流的现代英国人或欧洲人,那些油嘴滑舌地谈论中国的进步与改革的人,甚至连他们自身的文明也不知道,实际上不知道和不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文明,因为他不相信存在正确理性和上帝意志这样的东西,而不相信这种东西,世上就没有文明可言,只可能有无政府的混乱状态。

依我看,其实比我们旧式的中国儒生还远为不如的现代英国人更需要“开放”,一种心灵开阔意义上的正确开放。但“真正的开放”并不告诫人们说不存在可以据之判定孰是孰非、孰优孰劣的



晚清时期准备出国留学的学生

“至上之德”和“至当理由”这类东西。心灵开放的真正价值，在于能使我们领悟到像伦敦《泰晤士报》称之为我们自己“小小看法”的所谓“完美”，距离真正的、绝对的完美实在非常遥远。这种真正的绝对的完美，存在于事物的内在本性之中。的确，当英国人一旦弄清了真正开放的意义所在，他就会意识到他现在那种小小的猜测，即那种对于宗教和世俗完美的“小小看法”，实在是一个极其狭隘的“小小看法”，由此，他还会感到不再那么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这种小小看法强加给别人了。

然而，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实现这种真正的开放。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必不可少，用一句政界的时髦词来说，就是“门户开放”的原则。这不是贸易和铁路的“门户开放”，而是知识和道德上的“门户开放”。毫无疑问，没有知识和道德上的“门户开放”，真正的开放是不可能的。这种“门户开放”原则，用圣保罗的话来讲，就是“检验一切事物，择善固执”。

简而言之，不仅今日中国，而且今日世界所需要的，不是那么多的“进步”和“改革”，而是“门户开放”和“开放”，不是那种政治上的或物质上的“门户开放”和“开放”，而是一种知识和道德意义上的开放。没有知识上的门户开放，不可能有真正的心灵开放，而没有真正的心灵开放，也就不可能有进步。我已经给过圣保罗对“门户开放”的定义，下面，我再提供一个孔子关于“开放”的定义，孔子说：“在真正有教养的人们中间，是不存在种族之别的”(有教无类)。

正是怀着促进世界“知识上的门户开放”和“道德上的开放”事业之愿望，我写了下列文章，也是出于同一愿望，现在我将它们汇集成书，提交给公众阅览和批判。

辜鸿铭

1910年2月1日于上海



雅各宾主义⁽⁵⁾的中国

一个中国官员⁽⁶⁾致一位德国牧师的信

尊敬的牧师先生(Herr):

大约五年以前,在下给《字林西报》以“一个穿长衫的中国人”的名义写过一篇文章,在该文中我表示:“就我所见,目前中国维新运动中出现的狂热思潮,注定将要导致一场灾难发生。”现在,我的预言不幸应验,灾难来临了。共和主义革命以袁世凯将军成为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而告一段落。未识事情真相的人们都称对此感到意外,在下却不以为然。如果您读到辜鸿铭先生撰写的题为《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一书,您会发现,他将中国人分成三个等级——第一等、满洲贵族,第二等、中产阶级儒士,第三等、普罗大众或曰群氓。

也许您有必要了解一下,中国过去二百五十年的历史开始于满人当权,在太平天国暴乱后,中产阶级儒士的势力崛起。中日甲午战争后,满人重新掌权。世纪之交,义和团运动爆发,进而导致“庚子事变”发生。尘埃落定后,中国进入“三头执政”的权力真空期。而在眼下这场“新学”拳民暴乱⁽⁷⁾之后,我们就不得不面临庸众掌权的惨淡局面了。

正如我说过,五年以前我所预言的巨大灾难,现在来临了。然而,真正的灾难,请让我在此指出,它还不仅仅是导致全国流血漂橹、十室九空的暴行,真正的灾难是这场革命竟然以袁世凯成为共和国总统而告终!

目前这场革命,始于四川那场暴动,即保路运动。就这场暴动本身的性质而言,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合理的。此前,帝国政府公然允许外国人处